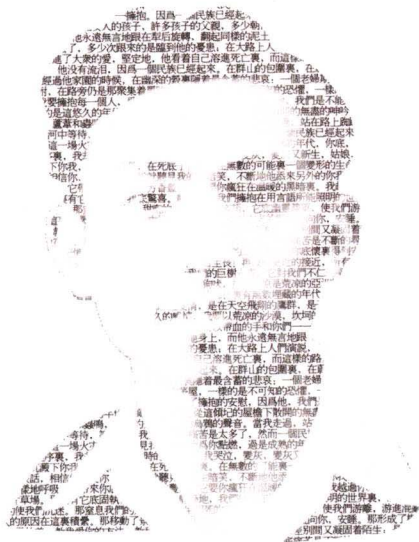


穆旦年譜



穆旦年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穆旦年谱/易彬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04-9114-9

I. ①穆… II. ①易… III. ①穆旦(1918~1977)-年谱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220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67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新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06年6月

追踪的意义

——易彬著《穆旦年谱》序

诗人穆旦的一生伴随着现代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事件，又遭遇了个性化色彩极强的特殊历程，人们常说的“个人与时代”的主题在这里获得了别样的呈现。

6岁在天津《妇女日报》发表习作，11岁考入南开学校后，频频列名于《南开高中生》杂志，穆旦展示的是引人注目的“早慧”。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已经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穆旦随校迁入长沙，接着又继续西迁，加入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进行的教育界“长征”，徒步远征达3500华里，这一次非凡的“长征”让穆旦真切地目睹了中国偏远的西南部，那些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底层的苦难，对于一个一直生活于中国都市与静谧校园的文学青年而言，这里的震惊不亚于一场精神世界的地震。1942年给予穆旦的痛苦更是永生难忘的。这一年的2月，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仅仅三个月后，他便亲历了一场无比残酷的战斗，“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穆旦）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森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①。这样置于生命极

^①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原载《穆旦诗集》。引自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限状态的体验是罕见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体验在把穆旦一次又一次推向绝望边缘的时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灵感。“痛苦出诗人”，大概没有比穆旦更能印证这句格言的真实性了。

在通常的意义上，大自然总是带给我们宁静与和谐，赋予美妙的诗意而给人心灵的慰藉，这是中国诗歌悠久的传统，也是现代中国诗歌在穆旦之前的惯常思维，然而战争的时代与个人的遭遇却让穆旦质疑了这一艺术的“根本”，于是他抵达了一处“前沿”性的艺术险境：究竟什么是诗？什么可以叫做“诗意”？似乎一切都有待新的估价。

抵达“前沿”的探险形成了穆旦诗歌一系列奇异的景观——在慷慨激昂的抗战时期抒写“人与战争”的荒谬（《出发》），在充满爱情梦幻的年龄刻画生存的虚无（《诗八首》），在旧体诗复活的岁月直斥传统样式的简陋（《五月》），在全民族的颂歌与赞美声中保留隐忧（《赞美》），甚至，在对孩子的祝福中也揭示了人生的狰狞（《摇篮歌——赠阿咪》）……我们常常用“丰富的痛苦”来概括穆旦的诗情，而在痛苦背后的，更有诗人丰富的人生故事与丰富的艺术历程。

二十余年前，还置身于大学课堂的我就被这种种的“丰富”所吸引，在缺少更多材料的时候就斗胆选择穆旦作为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所幸这一选题获得了蓝棣之老师的大力支持，并最终发表于我景仰不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此，我个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都与穆旦深深地熔铸在了一起，继续从新的深度来理解穆旦、解读穆旦成了我重要的学术目标，如何完整细致地追踪穆旦的人生艺术之路，始终是我努力的方向，为此，我曾经拜望穆旦夫人周与良女士，查阅战时旧刊，通过与李方、张同道兄合编《穆旦全集》继续积累史料，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工作的进程却未尽如人意，连多年前承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丁宁女士的《穆旦传》也尚未完成。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易彬著《穆旦年谱》，其用力之深广，考证之细密，在今天的穆旦研究中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在自我惭愧之余，我更多的则是欣喜和敬佩，因为，我们的穆旦研究从此可以说有了坚实的最综合性的史料基础，其开拓之功值得大力肯定。易彬还告诉我，与本书同时出版的还有《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研究》，同时，他还将继续致力于《穆旦评传》的写作和《穆旦诗全集（汇校本）》的整理工作，前者已经列入了出版计划，我衷心祝愿他早日完成这两部新著，为我们的穆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 怡

2010年6月于北京励耘居

目 录

追踪的意义——易彬著《穆旦年谱》序	(1)
呈现一个真实的、可能的穆旦形象——缘起、材料与体例	(1)
1918 年 生年	(8)
1923 年 5 岁	(10)
1924 年 6 岁	(10)
1929 年 11 岁	(11)
1931 年 13 岁	(14)
1932 年 14 岁	(16)
1933 年 15 岁	(19)
1934 年 16 岁	(20)
1935 年 17 岁	(22)
1936 年 18 岁	(28)
1937 年 19 岁	(30)
1938 年 20 岁	(37)
1939 年 21 岁	(45)
1940 年 22 岁	(49)
1941 年 23 岁	(59)
1942 年 24 岁	(65)
1943 年 25 岁	(73)
1944 年 26 岁	(77)
1945 年 27 岁	(80)
1946 年 28 岁	(87)
1947 年 29 岁	(95)

1948 年	30 岁		(109)
1949 年	31 岁		(123)
1950 年	32 岁		(127)
1951 年	33 岁		(129)
1952 年	34 岁		(130)
1953 年	35 岁		(136)
1954 年	36 岁		(148)
1955 年	37 岁		(158)
1956 年	38 岁		(166)
1957 年	39 岁		(171)
1958 年	40 岁		(180)
1959 年	41 岁		(186)
1960 年	42 岁		(190)
1961 年	43 岁		(191)
1962 年	44 岁		(192)
1963 年	45 岁		(195)
1964 年	46 岁		(198)
1965 年	47 岁		(199)
1966 年	48 岁		(201)
1967 年	49 岁		(203)
1968 年	50 岁		(204)
1969 年	51 岁		(210)
1970 年	52 岁		(213)
1971 年	53 岁		(220)
1972 年	54 岁		(228)
1973 年	55 岁		(230)
1974 年	56 岁		(235)
1975 年	57 岁		(238)
1976 年	58 岁		(247)
1977 年	59 岁		(270)
谱后	(1977—2010)		(284)

附录一 穆旦佚作举列	(305)
附录二 穆旦诗歌版本状况及汇校举隅	(325)
附录三 穆旦作品发表及出版名录	(341)
附录四 穆旦诗歌英译一览表	(353)
附录五 穆旦交游名录	(357)
征引文献	(385)
后记	(403)

呈现一个真实的、可能的穆旦形象

——缘起、材料与体例

一 缘起

穆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此前，坊间已有三种专门性的穆旦年谱或年表：日本学者秋吉久纪夫先生的《穆旦年表试稿》（荀春生译，1994）；李方先生的《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1996），后修订为《穆旦（查良铮）年谱》（2006）；陈伯良先生的《穆旦（查良铮）年表》（2004，2006）。第一种虽在国内影响不大，但秋吉久纪夫先生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积极传播者，他还曾将穆旦诗歌译成日文出版。第二种，作者是目前为止穆旦诗文最权威的编选者，他所勾画的穆旦生平的基本线索，为近年来的穆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引用率非常高。第三种附着于第一本穆旦传记而出版，也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

本谱即是在这些前辈辛勤劳作基础之上进行的。尽可能详尽地举陈穆旦的生平与写作材料，呈现一个更为丰富而完整的穆旦形象，透现穆旦和历史时代之间的更深关联，即是本年谱的最初缘起。在此，首先向几位前辈致敬，正是因为这几种材料奠定了穆旦生平事件的基本格局，本谱在这一方面得以省力，而尽可能地朝着“历史的细节”深掘下去。

二 材料

1. 材料范围

本谱所征引的文献资料，首先是穆旦的各种个人资料，即第一手材料，包括已公开出版的各类文字，也包括个人档案以及极少数未出版的文字或者佚作；其次为第二手材料，包括相关原始报刊、档案、校史、相关回忆录、传记、年谱、访谈以及研究著作，等等。具体到年份，限于材料，1929年之

前的非常粗略；1929—1935年（中学阶段），篇幅并不小，但多为第二手材料；1935—1958年，所列条目较为具体，第一手材料应是略多于第二手材料；1959—1970年2月，所记较为粗略，较多依凭相关回忆资料；1970年2月—1977年，穆旦存留有少量流水账式的日记，1975年之后又写有不少书信，所列条目很具体，多为第一手材料。

在具体展开过程中，本谱尽可能地利用第一手材料，但也较多地援引了第二手材料。前者自然是撰谱的要义所在；出现后一种情形，主要是因为穆旦本人的自述类文字较少。穆旦自述类材料之少，在现代重要作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个中原因，既与时代紧迫、相关资料较多佚失有关，比如，不少作品刊载于影响较小的地方性报刊，不易重新发掘整理，其中如曾较多刊载穆旦作品的《文聚》杂志甚至已找不齐完整的一套；也因为穆旦对于名声“觉得淡漠而又随便”^①，他无意于借助人生传奇来成就他的形象（穆旦一生实不乏传奇经历，如抗战时期的从军经历，1949年出国，又于1953年回国，等等）；当然，穆旦较早去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77年去世意味着未能活到文化语境逐渐开化的新时代，比照年长于穆旦的作家，如卞之琳、冯至，年龄相仿的如辛笛、袁可嘉等，即可发现所谓“自我塑造”在“新时代”乃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总之，多重原因共同塑型了穆旦“较少自述”这一历史形象。这为穆旦诗歌及其形象平添了几分魅力，却也增加了传记式研究的难度。本谱较多地援引第二手材料，即是希冀借此来弥补谱主个人叙述的不足。

第二手材料之中，相当一部分是背景性的材料——笔者粗略地称其为“同时代共生性的史料资源”。何谓“共生”呢？穆旦是中国新诗史和翻译史上的重要人物，绝非一个孤立的人物，而是呈现于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复合而成的。这些因素包括教育背景、媒体环境、政治文化语境、具体人事等方面，这些同时代的各类材料（因素）之间可谓天然即具有一种共生关系，能起到相互说明的效应，共同构成了彼一时期的时代语境。因此，本谱不仅举例穆旦的生平事迹，而且也着意举例了较多的外部性因素，其中，期刊信息即较多罗列，想要传达这样的观点：不同作者在同一刊物发表作品，在分享了同一发表空间的同时，更意味着分享了某种共通的历史境遇。当然，在相当程度上，这样处理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比如，穆旦各时期的学习情况，特别是中小学阶段，少有直接材料，本谱则补入了当时的

^①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

课程表等方面的信息；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经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人生关节点上，往往也是如此，本谱也视情况，或长或短地补入了相关背景材料。

综言之，本谱收集多重材料，是希冀能在穆旦生平之上，进一步达到如下几个设想：更为清晰地厘清穆旦的成长线索与空间，凸显穆旦与同时代人共通的历史境遇，呈现穆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深刻关联，落实此前学界对于穆旦的一些模糊认识（比如，在穆旦经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始终没有清晰呈现的“《新报》经历”与“外文系事件”等），甚至是纠正一些错误判断，等等。综合视之，这样一些设想与具体做法，无疑将使得本谱获具更多的学术含量，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提示了更多的线索与问题——线索繁多，问题也不可能穷尽，如果读者愿意顺着其中的某些点、某些方面深掘下去，那其实正是笔者所期待的。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笔者较早撰写本谱的时候，对于第二手材料的依赖程度相当之大，后来随着穆旦个人及相关档案的加入，这一局势得到非常大的改观。穆旦个人档案之中，有多份履历表或思想总结类文字材料，时间是从1953年回国之初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并有相关检举材料、复查材料等。借此，穆旦的生平线索得以更清晰、准确而深入的呈现。而这与前述所谓“自述类文字较少”并不能放到同一层面来衡量，这些档案文字材料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文化信息，因此，它本身即是个人所承受的历史压力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不妨选取一份简略述之，1956年4月22日所写《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一般的读者显然知晓这一时间本身即意味着什么，不过，这里倒无意强调这一点，而是想谈一谈所谓的“客观的叙述”。该交代分11个部分，其中10个部分为各阶段经历、行为动机与思想状况的交代，最末为总结。这是一般交代的程式，但开头部分有这样一段别有意味的文字：“在运动中，自己并且交待过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过，由于在小组上，感到群众的压力，并且由于自己的错觉（认为要说‘实质’和‘意义’，做了很多推论和假定），作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不负责任的交待。这里，我要就自己过去的重点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叙述，同时指出曾经作过的不负责任的交待。我想尽力作出客观的叙述，不加自己的批判，以便使组织对我的过去作出明断来。”在实际交代中，也就一再地陈述肃反期间的一些交代是如何“不符合事实”，比如，“美国留学”部分在交代了与罗又伦的往来后，有一小段文字：“在肃反小组会上我说罗又伦派我回大陆潜伏等话，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绝对没有的。”肃反期间穆旦向组织和群众交

代的场面已无法复现，但这份交代就真的是“客观的叙述”吗？显然也不是。

且不说文字中为自己所作的诸种曲意辩护，说一说当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细节：在交代出国前的思想状况时，穆旦写下了这样的对时局的认识：“我原已准备迎接解放，因为当时我认识到，共产党来了之后，中国会很快富强起来，我个人应该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高兴，他们翻了身，个人所感到的不自由（文化上，思想上）算不了什么，可以牺牲。”这段文字旁有四个字的批语：“纯粹扯淡！”在我看来，它以一种粗鄙而又地道的语言涵括了那些深谙政治文化奥秘的审阅交代材料者对于穆旦的“思想认识”的基本看法。因此，在运用这类档案材料时，笔者尽量只选取其中的事件线索，而剔去那些枝枝蔓蔓的“思想认识”。当然，即便没有“纯粹扯淡”一类批语，相信今天的读者对于此类材料自会有明晰的判断，不致迷失。

2. 偶然性与可能性

事实上，材料本身不仅仅有其复杂性的一面，材料之于穆旦形象构设的偶然性与可能性的话题也值得一说。

所谓“偶然性”，一方面，在于个别材料的加入完全是偶然的、意料之外的；另一方面，仅仅由实际存留下来的材料所组成的穆旦形象，也不得不带有较大的偶然性。比如，穆旦档案之中，有一类为“检举材料”，其中有一篇为梁再冰于1955年11月26日所写的《关于我所了解的查良铮的一部分历史情况以及查良铮和杜运燮解放后来往的情况》。梁再冰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约在1947年春与穆旦认识，之后有较多书信往来。显然是迫于某种压力，她写了这样一份长达11页的材料；其中，依据穆旦写给她的信，交代了彼此交往的情况。在穆旦个人的诸多交游之中，梁再冰本不算突出，尽管穆旦在填写各类履历表的时候，多次列梁再冰为证明人；但一般读者显然并不知情（事实上，熟悉穆旦经历的如笔者，也是直到接触了穆旦的档案，方才知悉穆旦与她有较多交往）。而材料既可以得到穆旦本人的相关叙述的证实，其基本真实无可怀疑，其中所提及的书信与相关内容以及一些事件自然也就按年月日列入具体的谱文，就这样，因为一份偶然留下的材料，梁再冰一下子在1947—1953年的谱文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可能性”也和材料有关。比之于“偶然性”，它在更多层面得以体现，它既指个别现象，即材料本身或是孤证，或无法得到充分的证实；也指一种

总体效果，即全部材料所构设而成的穆旦形象，有着不少不确定的因素。

具体而言，以本谱所利用的回忆材料为例，其作者不是穆旦家人就是友人，但从相关回忆的撰写时间看，往往距离事情发生之时已有一段距离。从经验的角度看，不仅回忆误差难免，“家属意志”与“友人塑造”也是难免的（相当一部分回忆文章均是写作于某些纪念日前后，如穆旦逝世10周年、20周年等，“纪念”这一机缘可能会对回忆产生影响）；但是，仅在极少数情况之下，笔者才能甄别出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差，比如综合穆旦本人的材料、多种回忆而得出某些回忆在细节时间上存在误差；更多的时候则无从辨识（可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笔者曾采访多位历史当事人，结果出现了相互抵牾的现象，有当事人对另外的当事人的“历史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回忆并不准确，是在粉饰历史、美化自己。这一度影响了笔者对于材料的取舍）。正因为有了一些不确定，材料的取舍成为了一个难题。洪子诚先生曾从文学史写作的层面来看取这个难题，他在考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写作的时候，提到当时研究者利用的材料往往都是“孤证”；“‘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条‘异端’的、秘密的文学线索，这方面的材料，我们只有某些当事人的陈述，这些陈述有时又含糊不清，或有矛盾，没有别的旁证，别的方面的材料来作为印证。这使我们陷入尴尬之中：你不能不信，但又放心不下，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材料比较脆弱，经不起检验，这个文学史就很可疑”^①。

在实际的处理过程中，对于那些存在误差或相互抵牾的回忆文字，笔者或将弃之不用，或将做出说明，或用多种文字材料并存。基于这样一种状况，笔者想强调的是，本谱所呈现的固然是一个更为丰富真实复杂，也更富历史内涵的穆旦；但在某种程度上，相关材料既较为驳杂难辨，所呈现的也是一个“可能的穆旦”，也即，某些材料——特别那些近乎孤证的材料，所呈现的更类似于一种线索，一种可能性，它能不能进一步凝缩成穆旦的品质或者特点，还有待更多材料的支撑。

而读者显然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在某些阶段，谱文内容翔实具体；而在某些阶段，谱文却又简单粗略。这样的详与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见出穆旦参与的程度或给人印象的深浅，但笔者要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这种深浅并非绝对，并非详细就是因为实际参与事件多，而简略就是因为参与事件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

少。前述梁再冰即是一例，它表明了详与略与材料的实际存留直接相关。又比如，晚年材料较多，既与书信较多存留有关，也与距离开放时代较为切近，有较多回忆文字有关，因此，接续前述话题，这里边也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也即，在更主要的层面上，详或略乃是因为材料获取方面的缘故，材料佚失、回忆盲点以及缺乏必要的自述等原因共同造成了某些阶段材料的简略。这一点，自然是希望读者有所辨明。

三 体例

1. 时间编排顺序

各种信息均按时间编订，力求精确到日。日不详者编入当月，月不详者编入当季，季不详者编入当年，年不详者编入年代。

2. 诗文录用原则

由于穆旦诗歌基本上都在末尾标注了写作时间；又由于穆旦对诗歌进行了较多修改，存在着多种版本，因此，本谱在实际录用中采取如下原则：

(1) 写作时间依诗歌末尾所标注，其中，如《隐现》，目前通行的集子均标为“1947年8月”，但据新发现的《华声》杂志1945年所刊载的该诗，其写作时间标注为1943年3月，很显然，这应是最初的写作时间。考虑到此诗后来在《文学杂志》等刊物刊登时，与初版本有非常大的差异，因此，本谱倾向于认为“1947年8月”为重订的时间。另有部分诗歌，如《童年》，不同版本所标注的时间并不相同，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以供判断，本谱均从出现最早的时间。发表时间则依具体的刊物；凡重复发表的，也一一列出。

(2) 凡涉及诗题变更的现象，如《摇篮歌——赠阿咪》，发表时题为《催眠曲》，均将初次发表时的题目视为最初的题目。但写作时间仍依诗歌末尾标注。

(3) 与诗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检索穆旦生前出版的诗集或作品发表刊物，部分诗歌如《诗》、《农民兵》、《赠别》、《成熟》等，诗歌分两个章节，诗题也相应地标为《诗（一）》、《诗（二）》，《农民兵（一）》、《农民兵（二）》，《赠别（一）》、《赠别（二）》，《成熟（一）》、《成熟（二）》，但从《穆旦诗全集》到《穆旦诗文集》，在这两种目前穆旦诗歌最通行的版本中，均取消了（一）、（二）的标注，而将两者合为1首。不知道这是穆旦本人生前所作出的修改，还是编者的行为使然，这里在诗题标注上从《穆旦诗文

集》，但在写作、发表或出版的相关部分，仍分开标注。

3. 关于文字处理的特别说明

本谱征引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其中多为各时期的印刷品，也包括部分打印或手写的材料，如各种档案。由此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不同时期印刷品的一些表述与今日的文字规范往往并不一致，如“的”与“底”，“哪里”与“那里”、“年轻”与“年青”、“和谐”与“合谐”、“好像”与“好象”、“相片”与“像片”等等，在该用前者的地方往往都是用后者。而在非正式出版物、特别是档案类手写材料当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如“交代”（问题）一律作“交待”，“副教授”作“付教授”，“介绍”作“借绍”，“申请”作“声请”，“艾略特”有时作“爱略特”，穆旦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作《九九家争鸣记》，等等。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本谱的处理原则是：凡所引述的原文中出现明显错误的，将加以改正，用[]加以标示，如“借[介]绍”、“声[申]请”；一般性的或可通用的写法将照原样录入。

4. 字体

为使事件更为清晰、突出，在谱文写作编排时，直接的、主要的事件一般用五号宋体标出，间接的、引述性材料则一般用五号楷体标出。

5. 征引文献

本谱所征引的文献繁多，由于《征引文献》中将一一列举，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注释，正文或注释所引文献均只标示作者、文献名、年份与页码，出版信息则请对照征引文献部分所列出的详细信息。

6. 五种附录文字

正式谱文之后，特意安排了五种附录文字：“穆旦佚作举例”、“穆旦诗歌修改情况举例”、“穆旦作品发表、出版名录”、“穆旦诗歌英译一览表”和“穆旦交游名录”。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年谱正文和注释更为简洁，不致太烦琐；另一方面则也是基于相关主题，以使穆旦的资料与相关线索得以集中呈现，给读者一个更为清晰而深入的印象。其中如“穆旦交游名录”，如果承接前面的话题，也蕴涵了寻求某种“可能性”的意图，总体来说，所列交游对象是较广泛的，部分出自穆旦个人档案，部分则出自其他史料；多数是单个的人，少数则是按某个群体列入，这般处理，旨在既凸显细节，又呈现出某种宽泛的交游范围，以使穆旦形象融入更广阔的传记背景之中。

1918年 生年

4月

5日 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查良铮生于天津西北角老城内北马路恒德里，祖父或曾祖父遗留下来的几房共居的老屋里。查良铮祖籍浙江省海宁县，为海宁袁花镇查氏南支二十二世“良”字辈。后有笔名穆旦（慕旦）、梁真等，以穆旦行世。本谱为统一称谓故，基本上以“穆旦”行文。穆旦本人成年之后在填写个人籍贯时，基本上均填为浙江海宁^①。

按：据陈伯良先生考证，查姓为我国著姓之一。元代末期，其中一支为避战乱由安徽迁往浙江海宁。世代“以儒为业，耕读为务”，逐渐繁衍成海宁望族，明清两朝更是出现了大批以诗文书法著称的文人士子，如查培继、查慎行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写：“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由于仕宦和经商等原因，清初即有海宁查氏后人迁往宛平、天津等地。约在清代晚期，查良铮曾祖查光泰（1829—1894，海宁查氏第19世）因为仕宦迁至天津，按族中惯例，仍称海宁南支。至祖父查美荫（1860—1915）50岁时，因存款的银号突然倒闭，一生积蓄尽付东流，家道骤然中落。

穆旦的父亲为查厚埜（1891—1977），母亲为李玉书（1892—1974），祖籍浙江余姚。有一姐一妹。姐姐查良镛，1914年生，后远嫁广西。妹妹查良铃，1927年生，后为北京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退休干部。对于家庭情况，1950年代，穆旦在“思想总结”类材料中曾有回忆：“我在1918年二月廿四日（阴历）出生在天津城内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里，祖父（原籍浙江海宁）做过前清的县官，死后留下一所房子由各房儿子合住，还有一笔不大的财产。父亲在天津法政大学毕业，在天津地方法院作书记官有廿多年，收入微薄，以此养活一房人。母亲未受教育。我家共有父，母，一姐，一妹，和我自己。大家庭中有祖母，叔伯数人，姑姑，堂兄弟等多人

^① 所能查到的重要资料包括：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名册，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穆旦档案中所有材料表格的籍贯一栏；至于在地域性（省份性）的文学史当中，浙江和天津都曾列入穆旦。